

共有的空间及其可能

——历史社会学视野中的中日关系问题国际研讨会述介

中日两国关于现代历史的认识问题是一个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实践性的议题,如何通过对话的方式,建立起理性沟通的渠道,不仅是正确面对历史,更是正确面对东亚未来前景的必要环节。为了获致对这一问题的同情之理解与深度之反思,探索更富建设性的对话空间和方式,需要一种更具通识性的视野,以及对于两国现代历史问题的复杂性与多层次相匹配的认识。而历史学与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诸领域的恰当结合,将是加深并扩展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有效途径。鉴于此,在日本笹川和平基金会的赞助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中心及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国际文化学系联合邀请了中日两国历史学、社会学研究者,于2004年3月19—21日在杭州举办了这次研讨会。

会议伊始,与会的近20位学者就传达出共有的旨趣,即:中日两国的现代历史认识,一方面内在于东亚的现代历史之中,另一方面则与东亚近代所共同面临的现代性问题紧密相关。因此,采用何种姿态来清理、评价、反思这段历史,不仅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更具有根本的“生产性”意义。围绕这个共识,两国学者就创建历史反思的“共有空间”及其途径展开了理性、深入而富有成效的对话。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三谷博先生运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从历史认识的“相对化”角度,讨论日本历史中的民主化问题,他说:日本的近代史从外部看,是对外侵略的历史;从内部看,却是一个朝民主化迈进的过程。民主化是需要“本土”条件支持的,三谷认为日本的“本土”条件主要是在民间、政府内部、民众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公论”的习惯。

针对三谷的发言,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的毛丹教授认为,三谷对日本民主政制史的考察、分析固然能够提高解释的效度,但他的判断中也含有内在的紧张:民主一方面被暗示为一种普遍价值;另一方面又被暗示着需要惯例——即地方性的知识或文化——基础;这又说明“民主以正当性作为内在依据的普遍性概念,又与各国的或者各个政治共同体的历史传统相关,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普遍性价值的推广问题,更不能简单地归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孙歌教授认为,三谷的发言触及到了一个问题,即“假如我们把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国家的民主的实践都

看成一个真实的可能性的话,那么那个抽象的民主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而且这种抽象的民主被具体化后,它还是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东西”。

日本中央大学的服部龙二先生选择了一个历史文献——《田中上奏文》的真伪问题来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黄平教授引入了关于社会记忆问题的讨论对之加以回应,指出:人的集体记忆,在记住一些东西的同时,可能忘掉某些东西,但记住和忘掉的都是真实的。要梳理的是细节里有什么构成历史的线索,这线索和脉络有可能把宏观与细节勾连起来。再者,一部分历史和细节的记忆真实性或虚假性不能颠覆另一部分细节的记忆真实性或虚假性。此外,社会史研究中,除了把历史引入社会框架,或者把社会引入历史来分析之外,还要有一个空间的视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则强调:《田中上奏文》是否存在不应成为一个焦点,但是《田中上奏文》的真伪本身成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却是很重要的,应把它放在它之所以成为真伪问题的脉络中分析。对此,三谷博先生也有同感,他指出:一些日本学者往往把个别的具体的历史细节拿出来,探讨其真伪,把它与日本整个的侵华历史“大事实”分割开来。这是一种错误地对待历史认识的方式。孙歌则从另一层面提出要对学术讨论中的这样一种情况加以警惕,即当某一“细节”碰到了“政治”时,往往因了“政治正确性”的顾忌,使得学术问题被转换,使讨论无法进行下去。

日本明治大学的铃木将久先生从竹内好的中国观切入来展开自己的论述。铃木说:二战后日本思想界大多是以西方的思想作为反省日本社会结构的手段或资源,竹内好却保持了一种独特的态度:以中国为思考的基点,试图通过引入中国问题来质疑包括自己在内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改变日本思想的深层结构,并从而避免西方中心主义的见解。铃木突出强调了竹内好“思想的强度”,竹内好政治选择的失败(他在1941年后公然支持大东亚战争),显示了他思想困境的强烈程度。铃木又指出,竹内好在战争期间目睹了中国的现实以后,经过深刻的自我反省和哲学思考,重要的是,他与鲁迅相遇,形成了以“抵抗”概念为主的独特思想:“他拒绝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铃木解释说,正是这样一种“抵抗”的思考理路,使竹内好认同于中国50年代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虽然这一认识放在中

国语境中并不正确),认为,思想改造也是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课题,因为,它的根本在于“以放弃自我而获得真正的自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贺照田先生在回应中,把竹内好对鲁迅的概括转成“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他人”,省思:如何在剥离政治不正确的基础上继承竹内好这种“深度之反思”,并思考这些命题对思考中国问题的意义,如何借助这种思想上的否定性契机来形成学术思考的真正的立场(主体性)等。他把建国后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些被人忽视的现象和要素——即中国学人所曾经具有思想上的“否定性契机”——纳入正面观察、思考的视野,指出,思想改造运动虽然为学人提供了促成其“拒绝成为自己”这样一个否定性契机,但它并没有一个足够的空间和机制使得这种自我否定性的契机能够往一种建设性的方向上发展”。贺照田说,这差不多也是中国接下来二十余年历次运动的共同特点。这种对起点、途路、终点、速度、方式都有一定外在规定的运动方式,不仅容易诱发投机作伪,而且也为投机作伪者如何表现提供了最方便的指南。而这实质上意味着推动一种最恶劣意义上的转向。但是,在否定这些运动的结构缺失的同时,贺照田认为,不应使我们连带忽视乃至无视这些否定性契机,以及由之导出的思想、实践摸索对我们认识中国现当代问题的意义。他认为,当下中国的知识思想状况极大程度上是在忽略、无视这些否定性契机的认知意义上展开的。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并不缺少“拒绝成为自己”的潮流,比如“与西方接轨论”;也不缺少“拒绝成为他人”的话语,比如相当一部分反西方中心论者,却少有人固执于“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他人”。这两种语言状态,虽极易建立自己对现实的批判,并使自己的批判立于顺畅的逻辑自洽,却不容易真正介入分析现当代历史现实中自我与他人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的缠绕部分,更不容易剖析、面对因真诚挣扎于时代困顿而出现的既非过去自我又非他人的新的主体状态和实践状态。因此,他说,反复体会这些否定性契机,将帮助我们告别在成为自己、成为他人间那种缺少建设性的颠沛状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冯刚教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认为我们在20世纪“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他人”这对矛盾当中缺乏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作为一种否定性契机的存在也没有突破它应有的突破。毛丹则对竹内好这种跨文化的理解策略表达了一些技术上的担忧,“通过他的文化来理解我,或者通过我的文化来理解他,这样一种跨文化

的理解策略,如果缺乏一个公共理解的平台,是不是只会产生‘思想的强度’而失去了以客观性为尺度的这样一个机会?最后得到的是一个双向的误读,虽然这个误读可能是有功效的”。孙歌教授则就铃木讨论的竹内好思想本身作出了回应,指出铃木的报告本身也具有很强的强度。但是“也犯了一些错误”,就是“把竹内好文本化,而没有把他历史化”。

第四位报告人是日方的刘杰先生,他提交的论文《在历史研究中日本与中国所拥有的共同空间》提出,“我们不当去追求共同的历史认识”,而要“把我们的工作和努力的重点放在承认对方的历史认识这样一个方面上去”。刘杰把“本国历史的相对化”作为构筑中日历史研究的共有空间,树立双方各自正确历史认识的有效途径。

杨念群教授对刘杰的观点作出了回应。他指出,在把本国历史相对化的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相对化的最重要的缺陷或局限。首先,当我们把本国的历史记忆相对化时,它是以科学的面目出现的。这种科学的面目往往抹煞了心理的意义和历史的细节的真实。其次,在把本国历史相对化的时候,不是以周边国家或周边文明或对方的历史作为他者,而是与自身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仅仅以自身历史的发展逻辑去替代理解对方的感受和历史的逻辑。在如何建构中日对话的平台和空间问题上,杨念群认为,如果要达到一种真正的平等的交流和理性的对话,我们必须兼顾,即在本国历史相对化的原则与作为民族主义他者的纠葛之间,必须达到一种有效的平衡。同时,中日双方把对方历史的理解转化为正确认识自身历史的存在的一种有效的资源。他的结论是:当我们认真地互相探讨或交流的时候,不要回避现实中所出现的差异和矛盾,不要寻求表面上客客气气的公共空间,而是一种真正学术研究、研讨意义上的和与不同。

针对上述四场讨论,孙歌教授做了总结。除了对具体的学术问题作出深度回应外,孙歌尤为提醒在历史研究和认识当中,要跳出非常直观的、表面化的“普遍性”逻辑,要警惕当前轻易的、形式化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并进一步指出“真正的跨文化必须立足于本国文化之内”,必须真正介入历史之流当中看问题,从而避免“文本化”和“非历史化”的论断,超越简单的“本土化”与“西方化”的二元对立逻辑,从而找到自己真正的“立场”。

(整理者:任强、胡丽娟、王燕锋)